

大畫水許



黃永玉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黄永玉大画水浒/黄永玉著. - 增订版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9. 12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141 - 6

I. ①黄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中国画 - 作品集 - 中国 - 现代 IV. ①J222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02834 号

黄永玉大画水浒(增订版)

作 者: 黄永玉

责任编辑: 应 红 李宏伟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封面题字: 黄永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68 × 188

字数: 80 千

印张: 7.75

印数: 001 - 10000

版次: 2010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141 - 6

定价: 42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(增订版)

黄永玉大画水浒

作家出版社



黄永玉 湖南凤凰县人，1924年7月9日出生。受过小学至初中二年的教育。16岁开始以绘画及木刻谋生。曾任瓷场小工、小学教员、民众教育馆馆员、剧团见习美术队员、报社编辑、电影编剧及美术学院教授。

写过诗、杂文、小说、剧本。

出版过画册、诗集、杂文集、木刻画集。

在中国内地和香港、澳大利亚、德国、意大利开过个人画展。

我画“水浒”

黄永玉

主持人：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文学馆，今天的“在文学馆听讲座”我为大家请来的是著名画家、学者，素有“艺术老顽童”之称的黄永玉先生，大家欢迎。

我这有本黄先生新出的书《黄永玉大画水浒》，里边有142幅图，画了142个水浒人物。黄先生用漫画和妙语的方式对水浒人物表达出自己的独特理解。可以说是怪生笔端，人物的形、神、貌、相各异。开篇第一页黄先生有这样一句感慨：“我准备木刻水浒人物的计划原本从1960年开始，刻二百幅木刻，两年完成的计划，可惜一幅也没有做出来，连两千多张卡片也丢了。要是那时候让我刻出来多好啊！”木刻没有，但是这本《大画水浒》留下来了。今天请黄先生来就是向大家讲一讲他如何大画

水浒人物的。我们表示欢迎。

黄：我一上台就紧张，跟朋友聊天，边喝茶边侃，聊上五六个钟头是可以的，到了大庭广众之下，我的联想力就没有了，幸好是坐着，要是站起来就更糟糕，所以我总是要先写个稿子。写稿子并不是代表我不会说话，如果问起我，我一定侃侃而谈，但要我自己来谈就一塌糊涂了。

“上场慌”是我根深蒂固的一个毛病。画“水浒”有什么了不起，那只不过是动手而已，但动口就不行了。所以只能讲一些我自己画“水浒”的一些经历和有兴趣的东西。

在座的有很多“水浒”方面的权威，因为“水浒”的权威类型是各种各样的，念过的那些书有关于“水浒”的生活、“水浒”的故事、“水浒”的武器，我在这儿谈“水浒”就是班门弄斧了。聊“水浒”也不是开玩笑的事，专家这么多，尤其在北京城，光靠胆子大、脸皮厚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。

画“水浒”是我的一个兴趣，如果在三四十年前说我这话，恐怕就要倒霉了。因为你凭兴趣搞创作是不行的。实际上，我这一辈子从事美术这一行当都是因为我对美术有兴趣。“文革”时有位老先生在斗争会上批判我，说：“黄某人画画完全凭兴趣出发。”虽然当时我正弯着腰低着头接受批判，但心里也不免付度他：“你这个老狗子要是平时对我这么说我一定请你撮一顿，一个人要是做一件事如果不是从兴趣出发，难道要从悲哀出发、从伤心出发、从愤怒出发、从失望出发吗？”做任何事都是要有激情、有兴趣的。我这个人就是从兴

趣出发，工作起来像踢足球一样。如果有人问踢足球的人：“你累不累？”“当然累。”但踢的时候谁又想到累的问题呢？踢完了累得半死，问下次还踢不踢，回答仍然很肯定，“当然踢了，那还有什么话说呢？”

我在“四人帮”垮台后，在毛泽东纪念堂画了一幅大画，27米长9米高，就是纪念堂毛主席坐像背后的那一幅。画完后拿到烟台用毛线织出来，做完这个工作后很多人对我感到有兴趣了，认为这是件了不起的事。有位记者来采访我时问道：“你在画这张画时，心里在想什么？”我说：“已经画了八十多天了，天天画，就想能早一点儿完成它。”他说：“不不不，你画的时候想什么？”我知道他心里想让我说：“我一边画一边想毛主席。”这怎么可能呢？一边想一边工作，哪有这种创作方式呢，这会影响工作的。我就说：“很累，很忙，希望早点儿完成任务。东想西想一定要分心，我就是对这件事有兴趣，愿意把这幅画画好。这其实是个开心的过程，谁还顾得上想谁呢？再说这也不合常情，在工作的时候是不会去想什么任务，想什么神圣的东西。”

总之，兴趣是很重要的，谁都不会一天到晚在某种伟大的意义中过日子，都是在很具体的工作里过日子。

中国的说部里“水浒”是最大的，不分老少都能琢磨到它的妙处，身边的人、身边的事都是大家熟悉的，当然比我们身边的东西更精彩、更动人。

我小时候看戏，长大后读书，“水浒”里故事情节的动人是最重要的，至于造反有理的政治方面的含义我是不清楚的，只觉得“水

浒”里的人非常可爱。我的祖母给我讲过长毛的可怕，她做姑娘的时候不像我们以后所接受的知识，长毛是个可爱的人物，我祖母当时就觉得长毛非常可怕。听起来就好像没有“水浒”人物那样入情入理、有意思，所以我小时候画的“水浒”人物都是从戏台上得来的，像李逵、鲁智深就是戏里挂胡子、画花脸的，没有想到真正的活人。

我的家乡——湘西凤凰县在1949年以前是30多年割据的地方，谁来就打谁，13个县由一个领导人管着。那个领导人国民党来打国民党，共产党来打共产党，所以呆了相当稳定的一段日子——30多年。辛亥革命成功后，他办了一个美术学院，中国美术史没有写过，但真正办了美术学院，一代一代画画的人出了不少。30年代蒋介石的势力进入湘西后，文化的局面没有了。原来我父母都是办教育的，1923年入的党，在家乡母亲还当过宣传部长。后来，国民党力量一进来，父母就相继失业了。于是父亲就到外面去谋事，母亲靠典当过日子维持全家的生活。我的祖母、外婆及5个兄弟住在离城四十五里远的地方——得胜营，算不上乡下，是个小城镇。清朝末期外公做过宁波的知府，死在宁波任上，后来把他的灵柩运回到得胜营。他是个很有面子的人，当然也有田有地，算是个不小的地主。我十岁八岁时有项任务，每隔一年半就要到外婆、舅舅家去告穷，希望他们帮帮我们家的忙。每次我一到外婆和舅舅就明白——要钱的“孽障”来了。于是先把我安顿下来，外婆一边哀叹妈妈的不幸：第一说是嫁错了人，嫁了我爸爸；第二是养了一大堆儿子；第三怨我爸爸学美术、学音乐赚不得饭。不过骂归骂、怨归怨，他们倒是舍不得我这个外孙，所以一下子留我住个把月，临走时还送我十块八块的光洋让我带回去。当然

不是我一个人走四十五里地，那时才十岁八岁，家里有个工人带着。

我舅舅有好几个，小舅舅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军人，平常在家玩枪、打猎、养马；二舅舅是个文人，有轻微的精神病，很文雅、安静，喜欢吟诗论文，知道我是个“水浒”权威，他很佩服我，彼此就成了很好的朋友，一天到晚谈“水浒”。他建议我，不要在地上、石头板上画人，向么舅舅要点钱，弄点毛边纸来订个本，画一本“水浒”多好。我想这个主意太好了，就在他的鼓励下，到么舅面前去要钱，没想到平时很少骂人的么舅破口大骂，连我爸爸和我一起骂：

“你还学你爸爸那么没出息，去画画、去做音乐家，弄得连饭都吃不饱。”骂了一大通，所以这个世上从此就不无遗憾地缺少了一部伟大的、珍贵的“水浒”文献了。这是我因为“水浒”所遭遇的第一次重大打击。

50年代末，我才30来岁，我认识了一个做木刻板的高手。他叫王世荣，能做最好的木刻板，住在安定门内。当时在中国、在北京他的木刻板可算是一流的，非常准确的3分3厘3，32开的宽度，3分3厘3，铅字的高度，不晓得他怎么做得那么准确。我就向他买了二百块木板，然后我的那帮朋友、老前辈都很热心地鼓励我做木刻“水浒”这件事情。老朋友、老前辈有聂绀弩、黄苗子、黄裳、汪曾祺等，大家都很高兴。苗子连卡片都借给我，他们还说等我刻完木刻之后分别给我写像赞。黄裳还特别送了我十几张原版的陈老莲的“水浒”叶子，这种豪情和大方好像古人才有似的。

值得笑一笑的是，除了我以外，这四位老先生都入了“座右”，吃了很多苦，多少年都不能翻身。这种诗情画意到以后正像我曾经收

藏过的寿石公的一幅对联所讲的：“与子之别略多白醉，勿我为念不改朱颜。”这就是我的第二个木刻计划开始的情况。当然，木刻板被抄掉了；二千多张读书卡片到了“文革”结束以后发现在专案组的地上被踩来踩去；陈老莲的“水浒”叶子早被那些狗日抄家的混蛋发了洋财，覆巢之危之下哪里还有什么理想？

那时候颠三倒四，朝不保夕。有个老画家李苦禅，他是山东人，人们问他：“揍你的那个人是不是你的学生？”他说：“不是，不是，他是我的爹。”不管多老的人做儿子的时间都太长了，浪费了真正最宝贵的时间。我曾算了一个细账，连搞运动带下乡25年浪费掉了，要是这25年让我们做事情，我们也不是个懒惰的人，不知能做什么事呵，真可惜啦！

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，我们以前年轻时在上海刻反饥饿、反内战的传单，上面有指示下来，木刻板要自己买，共产党在哪儿我们都不知道，只是接到上面的指示就拼命地做。有人开玩笑地说：“你们那个时候搞这种进步活动是自费闹革命。”我说：“对了。的确那时候都是自费闹革命的。”

到了解放前夕，那时我在香港，穷得不得了，因为兴奋，兴趣又大，买了一块造船的大船板，一米左右宽，自己运回郊区住的地方，自己刨，打稿子。没见过解放军，就开了封介绍信到深圳去见解放军，那个解放军还不是正式的，是个土八路，我就画了一些速写回来，刻了一幅《华南人民欢迎解放军》，是很大很大的一幅木刻，因为大所以不能发表，又没有照相机去拍它，制版也有困难。这样的一幅木刻到了“文革”时，竟挂起来被当作黑画展览。黑的原因是歪曲

了解放军的形象。让我站在凳子上接受批判，我心想：“你们这帮小王八蛋，以我当时的气派，两三天吃一顿饭，吃几个烧饼，喝自来水，共产党是谁都不知道就这么在工作着，你们现在有吃有喝，学校还拿12块津贴，什么材料也不用买，国家供应，有什么资格来批判我。”现在人老了，力气没有了，眼睛也不顶用了，精神也不专注了，所以木刻刻不成了，时间也不够了，快80岁了。

“文革”后期出了件怪事，毛主席对“水浒”说了话：“‘水浒’好就好在它写了投降。”姚文元接过了这段最高指示后，把“好”字拿掉了，批判“水浒”是本投降的坏书，连施耐庵一起批。这样明目张胆地与伟大领袖较劲儿，没有受到处分，这倒很难得。我当时出了一身冷汗。很庆幸那帮小家伙抄走了“水浒”的全部家底，也庆幸接二连三的运动使我忙不过来。要不然刻出那二百多幅“水浒”人物在姚文元的眼底下是个什么光景可就难说了。

但是老了以后还是想画“水浒”，于是就用了一年的时间在香港画了出来，一边画一边跟画里的人物开玩笑。比如说不太引人注意的轰天雷凌振，如果我不说这个人，恐怕人家不一定会知道是“水浒”里的人物。他是个管放炮的，所以我联想起了那首著名的抗战歌曲：“没有枪，没有炮，敌人给我们造。”我就把它写到画里去了。一个叫邹渊的爱赌钱，题字时我就说：“不去澳门，你上梁山干什么？”宋江的爹管梁山的钥匙，我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。还有个爱赌钱的阮小五，我让他打着灯笼游水过河去赌钱，这个是我小时候在家乡听老人家讲我们街上有人就是这样的：涨大水了，他就举着灯笼游泳过河去赌钱。我用来把它放在阮小五的身上。呼保义也义不到哪里

去。毛主席说过：“做领导一是出主意，二是用干部。”两个诀窍他都摸不着门，都是人家自己找上门来的。史文恭武艺高强，大家费了好大劲儿，轮流打才把他打下来。对于宋江这个人我不怎么佩服。对于史文恭的情况，在我想来宋江的统战工作应该做到他的头上，这样就增加了梁山上的力量，但宋江没有做，原因是应该好好地想一想。

再说高俅，我和朋友聊天时说，高俅碰到端王——后来的宋徽宗——就是个机缘，要是没有这个机缘，你球踢得再好，好得像马拉多纳这样的，如果碰不上年轻的宋徽宗也是白踢了。要是宋徽宗那天不想踢球，而是画画，那高俅也没有机会碰到他了。或者高俅精通的是“双陆”，而不是踢球，碰到徽宗也没用，所以看起来要精通多种玩艺儿，能碰到不同兴趣的领导人，就方便得多了。

最后说到洪太尉。他是开篇第一章里的一个大官，好像古今中外都不缺少极富好奇心的人，都喜欢看点儿奇怪的东西。《天方夜谭》里的拔瓶塞的渔夫，他把瓶塞一拔，出现一个大妖怪，但是他有本事让他回去，那妖怪上了当就回去了，他赶紧把盖子盖起来。他发动一件事，又能收回来。洪太尉就不是这样，他势大财粗，好奇心又特浓，别人叫他不要去揭盖子，他就说：“你们懂什么？”所以他亲自揭了这个盖，等黑气往上冒时，又吓得半死，妖怪走掉了，他又没有渔夫的本事，把妖怪弄回来，把盖子盖上。所以在我看来，“水浒”之好，就好在洪太尉揭了盖子盖不回去。若要盖回去了，哪还会有一部“水浒”呢？

我是个画画的，是个动手的人，让我谈话实在谈不出什么来，但是有什么要和我聊还是可以聊出来的。

我写东西有个毛病爱用繁体字，“文革”时批判我反对简体字就是反社会主义。其时我说：“毛主席也写繁体字。”他们说：“毛主席有简体字。”我说：“那不是简体字是草字体。”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写信、写稿子用毛笔不能用圆珠笔，老习惯不好改，用钢笔、圆珠笔写不出来，而且老得换稿纸，用毛笔就比较稳定，一直往下写就可以。

主持人：您的演讲稿写了多长时间？

黄：昨天一个晚上，一直写到今天早上四点。

主持人：黄先生比咱们年轻人身体好，早上四点写完，九点半坐在这儿来给我们演讲。他对自己有个自喻、自比：他是湘西刁民。“刁民”往往身体、精神精力都很旺盛，我们现在给他提问题，看看是否能把他“刁”住？

黄：肯定“刁”住了。

问：“文革”后期有个黑画展，当时有一张您画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，被作为黑画，认为您也是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，蔑视无产阶级专政。您能说一说这件事吗？

黄：那件事完全是冤枉的。有一个人为了讨好江青，到处找材料，香港有本杂志谈到这个问题说，用子弹从黄永玉身上穿过去打到周恩来的身上，那时很多人给江青提供子弹，什么《三上桃峰》、“蜗牛”事件等等，《猫头鹰》就让她逮住了。那幅画其实是给北京饭店画

的，那时北京饭店新盖的十八层楼，让我们去搞美术设计工作，江青手下有一伙搞美术的虎视眈眈地不高兴，就到处找材料。恰好一位南京的画家宋文治留了一本册页在许麟庐家里，许麟庐让我画。我那时还不认识宋文治，心想画什么呢？他说画个猫头鹰算了，我就随便画了只猫头鹰，结果这个册页又拿着给那位想讨好江青的先生让他画。这位先生一天到晚正等着机会拍江青的马屁，他一看见这幅画就把它当成材料了。其实早先许多人去他家玩时也画过，在他家画的猫头鹰他不说，单把册页上的猫头鹰拿去给王曼恬，正好有个动机搞了一个黑画展。押我们去看时我的画还摆在第七位，等过两天再一看，已经摆在第一位了。我在上面写的“文治同志惠存”的字用纸盖住。我说：“这样我就放心了，这完全是一个政治的陷害，是可耻的、最坏的表现，你胆子大一点儿就把那纸条打开。你怎么可以说是给北京饭店画的呢？这么小一张画能挂在北京饭店什么地方呢？”后来这件事过去了，当时有各种传说，但实际上就是那个人拿出去汇报的，想讨好江青。

还说我在许麟庐家画猫头鹰这件事。因为他家离我家近，他有九个孩子，是一个大家庭，而我家里简单，只有两个孩子，而且还有香港关系，万一有什么，让我家里知道就到香港去。可许麟庐受不了，他九个孩子怎么办呢？我听说这件事是在去为北京饭店画稿子收集材料的旅行途中，我们到了重庆、成都，马上要过春节了。听到传说北京现在要批判黑画，有一张猫头鹰的画很恶毒，一只眼开一只眼闭，当时我还不经意地说：“哎呀，画个猫头鹰这算什么呀，我不也常常画吗？”结果回到北京一看就是我，真没想到。当时让我承认这是攻

击社会主义，我说：“我没有想过，领导这么说也没办法，我自己是不会的。我大老远跑回国，为什么要攻击社会主义？”

问：有人说油画高雅，木刻低俗，所以现在人们纷纷搞油画，放弃了木刻，请问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？

黄：这不是高雅与低俗的问题，刻得好就高雅，刻得不好就低俗。高雅与低俗不在于某一艺术本身，而在于从事这一艺术的人。

这是手艺的高下问题。我以前讲过，美国某大学有人说中国的艺术比较落后，后来我给他讲了一两个小时的关于画画的事情，我说艺术跟科学不一样，以前是点蜡烛、点松明，现在是电灯了，这是科学的一种进步。艺术没有进步，只有繁荣，越搞越丰富，越搞越繁荣。过去六千年的彩陶，今天搞瓷器的人你敢说比它进步？那种造型，那种结实的美。当时没有这么繁荣，就是玩泥巴，烧起来，现在的玩艺多了。

每一个人的艺术最多一百年，到了儿子辈还得从头来起。俄罗斯的谚语说：不管你爷爷长得多高，你还要自己长大。科学可以继承，艺术得从头来。不管你是齐白石的儿子也好，是李可染的儿子也好，都得从头来，不能抽他的血，打在你身上就变成李可染。所以艺术不能说是进步或是落后。

问：今天见到您的第一感觉特别亲切，您身上有种很鲜明的湖南人特征——尖锐、不屈不挠、机智。您的作品让我特别感动的是一首诗歌《老婆啊！你不要哭》，想请您谈一下创作这首诗时的一些感受。

黄：“文革”时期下乡劳动三年。我还算是想得开的人，身不由己，难过也没用。我们每天劳动扛着锄头、箩筐，走十六里，晚上劳动完再走十六里回来，天天三十二里。我那时才四十多岁，还不要紧，有的老人家像李苦禅已经七十多岁了，真可怜，让人哀怨欲绝。尤其是快到村庄时，要过一个大的木头板桥，全是灰尘。我们这边要表示昂扬之气，要唱着歌回去，那边赶羊的赶着一群羊往这边走，羊咩咩地叫，我们唱着歌，我觉得太好笑、太有意思了。我每天晚上打着手电躲在被窝里要干两件事：一件是看《辞海》，那时什么书都不能带，所以用了三年的时间把《辞海》从头到尾看了两遍半，把眼睛也看坏了；另外就是写诗，写旧诗、写词，也写白话诗。那时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在北京，前途茫茫不知道怎么办，除了别哭之外还能有什么安慰呢？讲天、讲地、讲未来怎么好，鼓励他们？实际我自己也很茫然，未来怎么样我也不知道。

有一天，李可染的小儿子来了，偷偷地告诉我，林彪死了，我说：“林彪怎么会死呢？这么伟大的人。”几天前我妻子写信对我说：“阿林全家走鸡，冚家铲铲。”（广东方言，走鸡就是“开溜”，“冚家铲铲”就是“全家完蛋”。）我说：“哪一个阿林啊？是不是我的朋友啊？他怎么这么大胆啊，敢跑？”到李可染的儿子来告诉我这些，我才明白，别人还不知道。有一天，我和另外一个同事赶着大车去拉萝卜，走到半路见周围没有人，我就对他说：“告诉你一件事，你可不能说，死都不能说。”他问：“有这么重要？”我说：“对了，你要是说了你也完了我也完了，但我又想告诉你。”他

说：“什么事？”我说：“林彪跑了，完蛋了。”他听了我的话车也不拉了，整个人瘫在那儿，脸看着天说：“我没有听过，你也没有讲过。”我就是在这么紧张的气氛里生活了三年。

世界上有些事听起来简直荒唐，比如说：开水壶在冷天半壶是开的，半壶是凉的。水应该是循环着的，可却半边是热的，半边是凉的。走在路上，我三年根本不能画画，太阳快靠近地平线时，一滴一滴往下滴红色的光。平原上，有人说，太阳是方的。那时候我就用这个办法在画画，不能动手。三年的构思改变了我的画风，对画画的一些技巧建立了牢固的基础，回来我就开始画画不刻木刻了。

主持人：从黄先生讲的小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有多么狡黠。他抑制不住要和朋友说林彪跑了摔了的事，他不是跟朋友说，“我告诉你，你要说出去我就完了。”而是说：“你要说出去，你完了我也完了。”这样朋友才不会说。

黄：他是个党员，我是个群众，这个很重要。幸好很快就公布了有关林彪的消息。

村子里有个小孩我很喜欢，他叫五斗。有一天村子里开会，很晚才散，等五斗背着书包回来，我就问他：“五斗，干什么去了？”他说：“开会。”我又问他：“开什么会？”他说：“林彪跑他那个鸡巴了。”其实讲来讲去就是这一句，花了几个钟头讲。

在当时那样困难的生活中，如果你要难过就难过下去了，因此要善于解脱自己。我想将来我要写这一段在农村的事情时，内容一定是很丰富的。那时小孩子同我的关系都非常好，我抽烟时，他们就在苇